

庞燕芳

著

安吉拉·卡特 诗学问题

——解码《明智的孩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庞燕宁。

著。

安吉拉·卡特 诗学问题

——解码《明智的孩子》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吉拉·卡特诗学问题：解码《明智的孩子》 / 庞燕宁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 - 7 - 5161 - 9555 - 0

I. ①安… II. ①庞…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研究—英国—现代
IV. ①I561. 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683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229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燕宁的博士论文出版，祝贺她！

因为序写得多了，这句话看上去成了套话。但实际上，对燕宁来说，这是实实在在值得祝贺的事。因为这里面体现着她一生中最大的追求。我们的学生念到大学、研究生以至博士生，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追求，但大部分人还是按部就班来念的。在我带的学生里面，迄今为止已经拿到博士学位的有二十几人，起码有二十人是这样的，从本科念到硕士，硕士毕业或者直接读博士，或者工作几年再来读博士，都觉得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对于燕宁来说，却不那么寻常。以我的看法，燕宁在读大学之前，是一种不受拘束的学习状态，在学校不受老师的束缚，她的父母对她也是“粗放式管理”，这种状态在现行的高考体制下是不可能取得“理想”成绩的，这也造成了她以后的求学之路一直是磕磕绊绊的；但另一方面，这种“散漫”的学习过程也造就了她天马行空的思维和理解问题的独特性，而这也成为她此后做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做研究的人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为人稳重，思虑周全，因此做起研究来显得思维



缜密，整体感强，却也往往会缺少某种尖锐性；另一类则为人粗疏，率性而为，做起研究来就显得未必面面俱到、细密周详，然而却往往跳脱不羁，总会有让人感到惊异的地方。显然，燕宁就属于这后一种了。

最初，当她有意来报考南开大学的博士的时候，就跟我谈过她的学习经历，以及她的学习方式。那时她已从山东大学读完了在职的硕士，有了工作，然而她却时常到学校去参加各种课程的学习，包括哲学系的博士课程的讨论，让我惊讶的是，她一个外语出身的学生，居然去跟哲学系的博士生们讨论经院哲学的问题；虽然从她的讲述中，我知道她的发言往往是自说自话，提出问题多，回答问题少，但我发现，她有一种独特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学术问题，都能跟她自己正在思考的问题联系起来，哪怕这种联系是牵强附会的。坦率地说，比较起严整周密的思路来，我更偏爱尖锐而有灵性的思考与表达，所以在我招收的博士生中，那些出人意料考进来的学生多属于这一类型，即以他们奇特的见解和表述让我感到振奋。思考有漏洞是可以通过后期加工来弥补的，但如果思考过于平稳，要想出现过人之见则有时不是通过训练就可以达到的。或者说，这需要天分。燕宁的这种思维方式，也造就了她的博士论文的两个主要的特点。

一是能够把两个远距现象联系起来。我们说，一个论文首先要有一个有力的立论，那么这个立论怎样才算有力呢？维姆萨特在谈到隐喻的效果时曾提出过一个“远距”说，喻体和喻本（比喻者和被比喻者）之间的距离越远，比喻的效果越有力，比如“狗像野兽一样嚎叫”“人像野兽一样嚎叫”和“大海像野兽一样嚎叫”，哪个的艺术效果更有力呢？当然是最后一个。这个道理也可以用在一个论文的立论上，如果一个论文仅仅是描述了一个对象的艺术形态，并说明这个艺术形态与作者本人的艺术立场之间的联系，这个距离就是有限的，或者说，它的深度就是有限的；如果论文不仅描述了文本的艺术形态，



而且将其与某个隐藏着的历史文化现象结合起来，找到了两者的内在联系，那么，这个立论就是符合“远距”规则的，就是一种“有力”的立论。这也就是我说的，要建立起一个“深度模式”来。在我的印象中，燕宁提出要把安吉拉·卡特的作品与古希腊喜剧联系起来，还是在她入学之初所写的有关材料中，那时我还觉得有点牵强，因为其实卡特并没有明确地说过她的写作与古希腊喜剧间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有时把自己的小说称作“喜剧”而已。但后来我大致读了《明智的孩子》，觉得燕宁的观点是有道理的。这也使我想起了当年我在读书的时候，在郑敏先生家里听她讲解构主义，她是把德里达跟中国的庄子哲学联系起来讲的，一个在当代的法国，一个在公元前4世纪的东方，然而郑敏先生通过她的诗意的联想，说明了人类思维循环的基本道理。而燕宁把安吉拉·卡特和阿里斯托芬联系到了一起，一个是后现代的解构型叙事，一个是古典时期的谐谑型叙事，这两个“远距”现象，在一个“喜剧”的概念之下发生了如此奇妙的联系，使得我们对卡特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这种联想也有点类似巴赫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和古希腊的对话体文字以及梅尼普讽刺体相关联，从而说明了一种现代文体是如何在一个遥远的时空之中获得巧妙回应的。

燕宁论文的另一个特点实际上也与她的这种“远距思维”有关，那就是把一种文本现象置于一个文化史的链条中来加以审视，当然，这也是一种确立一个有力的立论的方式。现在大量年轻人的研究，包括我们自己的博士、硕士的学位论文，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研究，即确定一个对象，确定一个角度，然后就开始了文本赏析式的写作。我把这种研究称作是“基于一般知识的研究”，而不是“基于专业知识的研究”，也就是说，这样的研究其实只是作为一种学术训练的研究，而不是真正有所创见的研究。虽然找到一个解析角度，或者一种理论武器，也算是一种“深度模式”，但这是最基础的模式，或者说，它只是一个起点。一个真正的深度模式应当是把



一个现象放在一个宏大的框架之内的研究，或者说，通过对一个小的现象的解读，发现一个重要的文化史的问题。这也是我说过的症候式解读的方法。当然，这首先需要发现症候，即发现超于你的日常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反常”现象。比如，为什么安吉拉·卡特总是要写“组合”式的家庭，而不是写传统的血缘家庭？为什么在她的笔下，血缘之间的关系总是充满了悖谬，而友谊的组合却形成了和谐？——这就是一个症候，一个反常现象。即使在现代主义文学中，虽然他们描写了大量的“偶合家庭”，但也还是着眼于血缘制家庭内部的问题，但到了卡特这里，家庭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改变，血缘成为悖谬的起点，而非血缘关系却成为拯救人类的稻草。这当然是卡特本人的思想，但这种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 20 世纪特有的产物，还是西方思想史上固有的东西？这涉及“反逻各斯”思想的起源问题，反逻各斯主义的思想不是后现代才有的，实际上，它是从逻各斯确立的那一刻就有的。我上面说，郑敏先生居然把德里达与庄子联系了起来，这说明什么？说明人类的思想实质上总是多元的，固化与颠覆并存的，虽然在某一特定时期会以某种立场为主导，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思想的全面独白化。更何况，颠覆性基因在西方的文化中始终保持着十分活跃的状态，当然，这也源于这种文化的起始元素就包含了“弑父”的内容。就此而言，在西方的文化发展史上，一方面是血缘伦理的不断建构与强化；而另一方面，被逐渐建构起来的血缘伦理又不断面临挑战。它的最初表现形式反映在文学叙事中，便是家庭内部的利益和权力之争，而到了卡特这里，它干脆变成了导致各种人生悖谬的一种惯性结构，你不必去刻意表现血缘的解体，它本来如此，司空见惯；正是在这种境况下，“友爱”成为人类独有的道德方式。在燕宁的论述中，无论是对血缘的否定，还是对友谊的肯定，都被她放到了自古希腊文化开始的思想链条中来加以考察，这样，看上去一个浮在后现代碎片中的“成人寓言”，便具有了深邃的历史文化底蕴。



当然，一个论文的深度模式越有力，研究者就越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因为，这也就意味着你的研究视野扩大了，你需要解决的问题增加了，一个单一现象的研究变成了复合式现象的研究。在这个时候，对研究者就提出了两个要求，一个是强化思维的联系力度，也就是说，你不能因为你有了跳脱的思维能力而止步于跳脱，还要把跳脱的各个环节尽可能严密地缝合起来，才能让你的立论征服别人；另一个要求就是多读多写，这种“联系性”研究，仅仅靠脑子里有想法是不够的，要有材料来证明，就像数学研究要通过大量的演算来推导命题一样，文学研究也要通过大量的论证来维护立论的正确性。燕宁在后一点上是值得称道的，她围绕着自己的研究方向读了许多历史哲学方面的书，更重要的是她不怕写，她在入学前就这个博士论文的问题已经写了将近十万字的东西，这也就成为她能够在三年的学制之内完成论文的基础。至于论述的严密性，燕宁读博士的三年期间，在这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也得力于她的“能写”。尽管从天性上，她属于跳脱型的，但大量的写作是可以使思虑的周延性得到训练而逐渐完善的。因此，我也希望她能够在繁重的教学之余，坚持勤奋写作，做出更好的研究成果。

是为序。

王志耕

2016年4月于南开大学

前　　言

“卡特是继勃朗特和莱辛之后，英国第三位经典女作家。她塑造了1945年战后英国小说的写作方式。”有评论者对英国当代作家安吉拉·卡特如是评价。卡特一生创作过大量作品，《明智的孩子》是她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体现着卡特一生所坚守的诗学原则。关于这部小说的评论大多是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来展开，然而，卡特被称为最具独特性的作家，但其独特性是如何形成的，其独特性在诗学层面到底有哪些内容，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阐释。

众所周知，卡特具有很强的文体创新性，她热衷于各种形式的喜剧，并擅长小说、故事与戏剧、广播剧等不同文体形式之间的改写；她所创立的童话反写形式，更是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而《明智的孩子》的这种体式是她在借鉴古希腊谐剧（旧喜剧），主要是在阿里斯托芬的基础上创作的。

本书认为，卡特作为一个独特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其表达方式与阿里斯托芬的旧喜剧达成契合，如谐摹、猥亵和粗俗言语的大胆运用，新老躯体形象的怪诞组合，此外还有人物双声、意象主义、



假扮或颠倒等，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一种谐剧体，或者如巴赫金所说，是一种“古典庄谐体”；而《明智的孩子》中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精神也是在谐剧反讽立场的影响下形成的。

由此，本书对《明智的孩子》进行诗学研究，揭示其“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诗学形态同阿里斯托芬谐剧的庄谐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它的独特性。

本书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

绪论部分由两节构成，第一节是立论和背景介绍。梳理了“逻各斯”在西方哲学思想史的发展，并提出与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逻各斯中心主义”所不同的是，阿里斯托芬主张在“理性”的维度上纳入“人的主体性”即“一般实践理性”，人本主义是谐剧的实践理性的核心。谐剧通过古典庄谐体把相悖的两级展露出来，意在颠覆理性秩序，消除权威的划界。

安吉拉·卡特之所以产生“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是与她所处的“现代性”时代密不可分的。“现代性”的精神实质是“理性主义”，这种权力的垂直控制方式在进入现实伦理层面后，转换成专制的统治方式，因为它将人的存在概念化和逻辑化，从而忽视了人的具体存在，而人的存在永远处在不断生成的不确定性之中。卡特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对人的机械操控，具体表现为反撒切尔的国家主义强权，反血缘的非法划界或血缘制霸权。作为一位独特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卡特运用阿里斯托芬谐剧的庄谐体这一在后世消失的文体来颠覆和打破这种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支柱的文化稳定结构，并重建新式多元伦理观，而她的《明智的孩子》是其谐剧文体和精神特征的体现。

第二节是研究综述。梳理了国外学界以往对《明智的孩子》的四大研究方向，以及传统研究中的五种主要论题。本论文认为，通过对卡特谐剧特征的考察，可以有效阐释文本中的多方面诗学特



征；并指出，庄谐体既是技巧也是一种世界观的表达，是卡特最后一部小说的核心理念，体现了她反对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反大英帝国中心主义、反血缘制家庭伦理的观念。

正文包括六章。

第一章论述了卡特“反逻各斯”精神的形成。卡特反对理性主义对不断生成中的人的机械控制，这是在谐剧世界观的框架下进行的，从而构成其对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支柱的血缘制霸权和国家主义强权的反叛精神品格。

阿里斯托芬的谐剧在“逻各斯”的起源——诡辩论的修辞学——开始了对“逻各斯”的反叛，并通过人物姓名的双关内涵和对神圣文体的谐摹来打破“逻各斯”。卡特继承了这一表现形式，其“反逻各斯”的精神根基也是从人物姓名双关内涵的非现实性、对上层社会、高雅文化的谐摹来反对以“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精神根基的血缘霸权制和帝国中心主义的。

另外，谐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有争议的社会热点问题编织到文本中去。阿里斯托芬在其谐剧中主要是以雅典的公共政治事务作为其艺术题材，表达了他在“生活世界”或实践理性方面对“逻各斯”的反叛。而卡特的“反逻各斯”文本与政治现实之间也形成一种紧密的互文关系，通过隐喻的方式影射其所处时代的时事政治，从而以谐谑的方式解构了现实中的权力压制。

第二章具体分析了卡特谐剧世界观的构成，对《明智的孩子》所特有的谐剧性的生成机制加以阐述。首先指出，《明智的孩子》对“逻各斯”的反叛性和超越性不仅同“酒神”精神一脉相承，从而形成一种不断生成、不断变化与超越的世界观，而且还同阿里斯托芬反对“狭隘性”的世界观密不可分。阿里斯托芬的“寻找另一半”神话和“打嗝”寓言是其反对“狭隘性”、追求“完整性”的世界观的体现。其次，卡特还通过谐剧真正的“喜剧性”来表达人物“主体



性”的超越性质，来抗拒现代主义语境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形成其“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精神品格。最后，卡特所处的“现代性”的时代特征、英国撒切尔政府所奉行的国家主义强权国家的状况，及其对喜剧所特有的爱好共同参与了其谐剧世界观的塑成过程。

第三章论述了卡特“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主题——对血缘伦理的解构，以及卡特本人的“新式亲缘家庭”观。这种新式伦理观反对血缘霸权，反对以血缘为中心的非法划界。首先，卡特的伦理观是她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的结果；其次，这种伦理观是在特定的西方传统血缘伦理的框架内形成的，有它赖以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在西方传统的血缘伦理观念中存在着悖谬，同时它也是整个欧洲社会现实的一种抽绎，即：一方面，血缘制家庭日益分崩离析；另一方面，血缘纽带严重束缚人们精神自由的多种可能性。在新式非血缘家庭关系的理想建构中，卡特描写了非血缘关系之上而具有真正亲情的家庭组合，通过哈泽德家族三代人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演绎了合法非血缘、亲缘非血缘、非法而亲缘、血缘非亲缘等纷繁复杂和颠倒错位的人物关系，消解了婚姻制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排除了血缘非法划界的羁绊，从而创造出一个准合法，但更符合卡特本人精神理想的非亲缘家庭组合。

第四章论述卡特的“友爱”法则与新式爱情伦理。卡特对现有血缘制家庭伦理观的驳斥是从摧毁旧家庭体制的根基——爱情观开始的。而在后现代主义消费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纵欲享乐的游戏化爱情观，同样是卡特所贬斥的对象。卡特对于爱情、婚姻、家庭有其独特的伦理学解读，在她看来，人类最美好的情感是基于“友爱”（亚里士多德语）的温情，而非令人心绪起伏跌宕的爱情。这种“友爱”观的确立直接构成了卡特所推崇的新式家庭体系观念。卡特崇尚亲情，但亲情的牢固根基不是血缘关系，而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交往中的“友爱”。

第五章承续上两章的主题，继续探讨《明智的孩子》中的非婚姻



制亲缘家庭观主题。以婚姻制为根基的家庭体系在欧洲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早已备受诟病。实质上，卡特的新式亲缘家庭的伦理根基是后现代的新伦理观，即正义性道德和商谈式法制伦理。它是对人性和自然法则的尊重，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共同体”，显示了真正的人性化伦理观的诉求。

第六章解析《明智的孩子》的“反逻各斯”形式品格，重点分析古典庄谐体和意象主义两种形式。庄谐体是狂欢化文学文本的典型特征，其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自发性，这与相对固定不变的日常生活结构相反；二是颠覆性，对法律和禁忌的暂时搁置，后者构成了狂欢节之外的生活。这种表达形式贯穿整个《明智的孩子》文本，最终归结于卡特本人的谐剧世界观。《明智的孩子》作为一部庄谐体文学具有五个特征，即：①谐摹；②粗俗与神圣语言；③新老接替的怪诞躯体形象；④强对比与矛盾组合；⑤人物双声。这些特征的功能是以通俗消解神圣、以谐谑颠覆秩序、以多元替代专权等，因而总体上形成“逆转对立结构”并进而达成新的建构性的形式品格。

此外，小说通过虚幻性手法赋予一切稳定性结构以未完成的开放性质；通过赋予人物特有的“意象主义”特征，以及颠倒和假扮的手段，把看似封闭性、稳定性的系统彻底翻转，并最终建构一种未完成、开放和不断更替的新型结构。

本章最后总结了卡特的哲学世界观。通过阿里斯托芬谐剧世界观的挖掘，以及其对巴赫金狂欢所做的区分，探索了卡特缘何拒绝别人把她的作品同巴赫金“狂欢”做比较的原因，而这对于深入了解卡特的哲学世界观十分重要。总之，狂欢化的庄谐体不是卡特的目的，仅仅是卡特“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立场的表达形式，她的谐剧世界观也是这种哲学立场在其诗学原则中的具体表现。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立论和背景介绍	7
第二节 研究综述	14
第一章 卡特“反逻各斯”精神的形成	30
第一节 卡特“反逻各斯”的精神根基	30
第二节 卡特“反逻各斯”文本与政治现实的互文关系	46
第二章 卡特的谐剧世界观	59
第一节 谐剧世界观——作为一种文化的历史	60
第二节 人物“主体性”的“超越”性质	67
第三节 卡特谐剧世界观的形成	72
第三章 解构血缘伦理：“新式亲缘家庭”观	77
第一节 卡特伦理观形成的个人体验	78



第二节 卡特伦理观形成的文化结构	88
第三节 旧式血缘家庭关系的悖谬揭示	94
第四节 新式非血缘家庭关系的理想建构	102
第四章 “友爱”法则与新式爱情伦理	108
第一节 后现代社会的游戏化爱情观	110
第二节 《明智的孩子》对后现代道德观的否弃	122
第三节 论《昨智的孩子》的反“爱情”观	130
第四节 卡特的爱情伦理与“友爱”法则	143
第五章 人性的自然法则：非婚姻制亲缘家庭观	159
第一节 欧洲文化史上的婚姻制家庭观	160
第二节 《明智的孩子》中的非婚姻制家庭观	166
第三节 “非婚姻制亲缘关系家庭”中的德行友爱	174
第六章 《明智的孩子》的“反逻各斯”形式品格	191
第一节 古典庄谐体	192
第二节 卡特的“虚幻性”	223
结语	235
参考文献	240
后记	258

绪 论

安吉拉·卡特 (Angela Carter, 1940—1992) 生于英国伊斯特本的苏塞克斯的伊斯特本 (Eastbourne, Sussex), 布里斯托大学 (Bristol University) 英语专业毕业。作为一个用多种体裁进行创作的多产作家, 卡特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英国作家之一, 也是最具独创力、最激进的和最具风格的小说家之一, 她生前便取得了经典文学家的地位。伊莱恩·肖瓦尔特 (Elaine Showalter) 称卡特为英国文人的膜拜对象, 因为她对当代英国女性的写作起着关键性的影响, 她的书写风格混杂魔幻现实主义、荒诞派、科幻、哥特式、黑色幽默、女性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 但皆不足以涵盖其全部。她尤其以“对童话进行猥亵的女性主义改写”^① 和独特的写作风格著称文坛。“卡特是继勃朗特和莱辛之后, 英国第三位经典女作家。她塑造了 1945 年战后英国小

^① Carol McGuirk, “Drabble to Carter: Fiction by Women, 1962—1992”, John Richetti ed., associate editors, John Bender, Deirdre David, Michael Seidel,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p. 942.



说的写作方式。”^① 这种写作方式的表征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神话叙事的颠覆。神话式的独白叙事塑造了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常常不去探究原因。英国学者丹尼·卡瓦拉罗（Dani Cavallaro）也称，安吉拉·卡特作为一个具有全球地位、经久不衰的作家，在对既成通俗体裁的创新性加以重新定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尝试。^② 作为一位文化颠覆者，她借助于以性政治为标志的大众文化的影响，探索并昭示了人类受压抑的、无意识的恐惧。在欧洲的女性写作中，安吉拉·卡特在波伏娃和杜拉斯之后，为解放式女性写作注入了崭新的气息，成为备受当代女性以及广大读者喜爱的全新偶像。

卡特著有9部长篇小说、3部短篇小说集，以及2部新闻写作集、1部戏剧作品集、1部影视作品集等非小说集。她于1976—1978年担任谢菲尔德大学（Sheffield University）大英创意写作艺术委员会的委员。1980—1981年，她是美国常春藤名校之一布朗大学写作项目的访问学者，随后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游学。她的《魔幻玩具铺》（*The Magic ToyShop*）获得约翰·勒维林·里斯奖（the John Llewelyn Rhys Memorial Prize），《几种感觉》（*Several Perceptions*）获萨默塞特·毛姆奖（Somerset Maugham Award），《血染的房间》（*The Bloody Chamber*）获得切尔滕纳姆节文学奖（Cheltenham Festival of Literature Award），《马戏团之夜》（*Nights at the Circus*）获杰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the James Tait Black Memorial Prize）。

她的作品也深受媒体喜爱。“1985年长篇小说《马戏团之夜》的出版奠定了卡特作为一名著名作家的地位。对卡特的名气更具推动力的是她的作品进军另一媒体电影——短篇小说《与郎为伴》（*The*

^① Malcolm Bradbury,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1878—2001*,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p. 515.

^② Dani Cavallaro, *The World of Angela Carter*, Jefferson: McFarland & Co, Inc., 2011, p. 1.